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共解决乡村民生问题的路径选择

曾耀荣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赣南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随着近代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近代乡村面临着严重的发展危机,并由此产生了近代乡村民生问题,中共最初提出用土地改革的方式来解决。土地改革虽然解决了农民尤其是大多数贫雇农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问题,但却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此,中共提出发展生产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手段,并要求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首位。在解决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后,广大贫苦农民还遇到了生产资本不足的困难,农业贷款成为中共解决生产资本和民生问题的重要选择。

关键词:发展危机;发展生产;农业贷款;中共;民生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4)01-0036-08

2010年,笔者参加导师王先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百年)史”的开题报告会,王老师在会议上提出,20世纪中国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民生”问题。此后,笔者一直在思考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解决近代乡村民生问题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目前学术界集中于三个主题:中共解决民生问题的整体研究、中共领导人的民生思想研究、特定时期和区域的民生问题研究。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中共民生思想的来源、内容和特点、具体措施、主要领袖人物的民生思想,以及民主革命时期井冈山、中央苏区与陕甘宁等区域的民生建设实践。^①上述研究对我们了解中共解决民生问题的思想和实践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些研究很少与近代乡村社会基本特点结合,因而很难揭示出中共解决民生问题的思想和实践的实质。我们认为在研究近代乡村民生问题过程中,需要立足

于近代乡村社会与中共革命两个基点,从近代乡村发展危机的前提出发,分析中共解决乡村民生问题的基本路径。

一、发展危机:近代乡村需要解决的民生难题

自晚清开埠通商以来,近代中国工商业经济逐渐发展。“新型经济关系乃至社会结构变动基本发生在通商口岸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等地,从而形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二元格局,即在现代化、城市化大趋势下的城乡二元分离性进程。新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生活方式的巨大的结构性变动,几乎都集中发生在城市社会里。”^{[1](P4)}近代中国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改塑了传统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关系,形成了近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现在都会和农村,好像在同一个国民中分成了

收稿日期:2013-11-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项目编号:10&ZD07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YJC770007)

作者简介:曾耀荣(1969-),男,湖南邵阳人,历史学博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乡村史和中共党史研究。

二个国家,无论从人口构成上看之,从语言上看之,从产业上看之,从住民的心理上看之,都是很明瞭的。这两者不啻是相分而已,动辄站在对立的地位,成为对抗的两大势力,虽然没有强大的分化的倾向,在现时的社会生活上,却是增加了造成最有力的分解的作用。”^{[2](P95~96)}近代城市已经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心,形成了对乡村社会的绝对优势和控制,也导致社会资源由农村向城市转移,比如农村土地所有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农村资金由农业资本转变为商业资本、农村劳动力转化为工厂工人等等。“在近代史上,新工业和新都市的勃兴,没有一个地方不是以农村劳动力被牺牲为代价。”^{[3](P8)}近代中国城市发展和繁荣是以剥夺和牺牲农村发展为代价的,这种发展趋势造就了都市畸形的发展和农村的衰败,也导致了近代乡村社会普遍的贫困。“我国农村之贫困,农业之幼稚,均无可否认。”^{[4](P1)}“在全中国的国民中,现在能够衣食无忧的,不过百分之六强;而绝大多数的百分之九四弱的人民,竟无法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5](P4)}

但是,随着对近代乡村社会的了解和近代乡村史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近代乡村虽然处在贫困阶段,但绝大多数家庭还是能够维持生计或勉强能维持生计的。1926年10月,当时很多人认为江苏和浙江两省是太平富庶地区,“农民并无多大痛苦”^{[6](P1)}。1929年2月,杨克敏认为:“(湘赣)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日常生活程度颇低,米一元钱可买四、五十斤,茶油每元钱可买八九斤,盐每元七斤,普通一个人生活,有一元多钱就可度过一个月。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有性颇懒。”“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酃、茶、莲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景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7](P18~19)}。同时期,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卜凯教授对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经济及社会调查发现,河北盐山县农民收入不多,农民生活比较节俭和窘迫,尤其是冬天农闲时节,每天只吃两餐,而每餐都是粗粮素菜,但是“农民尽可维持其勉强之生活”^{[8](P165)}。1933年,王云五、李圣五认为,农民家庭每年总收入平均为百余元左右,很少超过两百元的。由于收入很低微,农民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绝对不可能享受舒适的生活。”^{[9](P41)}1934年,广西师专在苍梧、桂林等地调查后注意到,一般来说乡村地主、富农和中农能维持基本生活,而大多数贫农在出卖劳动力或兼营副业的情况下也可

以维持其生活^{[10](P59)}。1935年私立福建协和农学院在福州紫阳村进行农村调查时发现,102户收入在250元以下的家庭收支不抵亏缺74.500元;49户收入在250—349元的家庭亏短77.000元;20户收入在350—449元的家庭亏损62.796元;1户收入在450—549元的家庭盈余37.000元;1户收入在550—649元的家庭盈余50.000元;1户收入在1000元的家庭盈余120元。他们认为,农民家庭平均每年亏短70.057元,由于米、菜蔬和燃料等都是农民自己生产的,不需要花钱在市场上购买,所以大多数家庭即使亏短70.057元,还能够勉强维持其家计。^{[11](P22~23)}1947年,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在河北、山东、河南省4个县5个村进行农村经济社会调查后发现,各个阶层最高亏损为1.899石,最低亏损为0.510石;如果计入四项收入,收支相抵所余不是很多,平均为0.439石。由于农民注意量入为出和勒紧腰带过日子,常常能做到收支平衡或者少亏和不亏,即使出现了收支不抵,还保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12](P34)}曹幸穗的苏南农村研究表明,近代苏南乡村居民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种地之外没有其他收入的“纯农户”或“种田专业户”,他们是种田大户,收入较高,是乡村中的“富户”,没有生存问题;第二类是“无地农户”,他们进入城镇当工人、店员,或从事农村家庭工商副业、自由职业、长工女佣、乞丐等,并以此谋生;第三类是既种地又兼营其他职业的农户,称之为“兼业农户”,他们一面耕种自家的小农场,一面从事农业以外的副业经营,这些兼业农户副业收入多少与农场规模大致呈反比例关系。他们通过副业收入来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借此以维持生计。^{[13](P232~233)}斯科特认为:“保证自身的基本生存需要,这个此时此地不可避免的行动方针,有时迫使农民以自己的未来作抵押。”^{[14](P17)}陈志让也认为,近代中国农民仍然以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他们的经济考虑依然是以家人生活安全放在首位^{[15](P132)}。基于生存安全的需要,农民会通过各种途径来解决生存问题。“其实这些自耕农民大多也是异常缺乏土地,他们单靠田地上的收入决不足以维持生活。因此他们必须兼营苦力、小贩,以至割草、拾粪等副业。就在农忙时期,也须抛弃了自己的田地,去受地主富农们的雇佣。”^{[16](P20)}

传统中国的乡村危机是“根源于土地兼并及赋税沉重剥削下广大人民的极端贫困”,它更多地体现于乡村社会的生存危机;而“近代的乡村危机也不是一以贯之没有变化。从性质上讲,存在着从传统危

机向近代危机转变的问题”^{[17](P107)}。自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关于“农业恐慌”、“乡村崩溃”、“农村破产”等话语开始广泛出现,民国时期一些知名度较高的综合性报纸、杂志,例如《东方杂志》《大公报》《益世报》等都对“乡村危机”给予了大量的关注,舆论一时蔚为大观^{[18](P13)}。王先明教授认为,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危机,当时人们或又称之为农村崩溃、农业恐慌、农村凋敝、农业破产等等,只不过是概要言其某一个侧面而已。实际上,其时的乡村危机是一种全面性的深刻的社会危机。20 世纪之乡村危机完全不同于传统时代的乡村危机,其导因一方面是基于传统社会矛盾的演化积累,另一面又基于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新的矛盾的催生和积累,呈现着生存危机与发展危机的二重性特征。^{[1](P7~10)}张富记、陆远权也认为:“近代百年农村发展迟缓,其些微发展也未为普通农民所得,无助于农村社会的发展与农民的进步。落后与破产始终与农村相伴,广大农民一直处于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之中。”^{[17](P106)}但是,既然近代乡村基本能维持生计,这就说明近代乡村生存危机不是非常严重的。1935 年春,美国经济调查团到中国上海、香港、南京、北平、汉口、杭州等地进行经济调查后认为:“中国经济危机,不如外传之甚。”^{[5](P1)}因此,我们认为,近代乡村危机与其说是生存危机,还不如说存在着严重的发展危机。近代乡村发展危机主要表现为农民所拥有和掌握的发展资源的短缺和不足。在近代乡村工商业尚未发展起来的情况下,乡村民众解决民生问题主要依靠农业,土地、劳力和资金成为近代乡村发展的主要资源,而近代乡村所缺乏的主要是土地和资本。近代中国人口众多,农民又占绝大多数,尽管中国可耕和已耕地面积并不少,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占有量还是相当低的。如此,作为农业生产基础的土地资源并不丰富,土地不足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充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公平合理地分配使用土地,对于国计民生而言至关重要。^{[19](P19)}然而“土地固为生产之要素,然无资本,仍属无济于事,故经济学者以劳力、资本与土地为三大生产要素,诚不易之言也。今农村中,劳力固绰绰有余裕,土地亦勉可分配,独资本颇感缺乏,且利率奇高,借款者颇不合算,生产事业,自不能求精进,以与外货抗拒,甚或事业完全停顿,难谋恢复,故今日农村中需要资本颇殷”^{[20](P20)}。解决土地和资本问题,成为近代乡村解决发展危机的重要内容。只有解决好近代乡村的发展危机,才能真正地消除其生

存危机,才能解决好近代中国乡村的民生难题。

二、从土地革命到发展生产:中共解决民生问题的思路转变

面对着近代乡村的发展危机,如何解决近代乡村的民生问题,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社会力量及中共纷纷提出自己的对策。近代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唐启宇先生认为,农业发展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力和资本三个方面。^{[21](P15)}南京政府基于平均地权推行困难,从改良农业技术入手,希望通过社会技术层面的改革来解决乡村危机;以梁漱溟、晏阳初为首的知识分子主导的乡村建设,希望通过乡村文化重建乡村社会;中国共产党则希望通过土地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1](P10~13)}从当时社会解决乡村危机来看,南京国民政府、社会力量纷纷避开了土地问题,只有中共从土地问题入手,进行土地制度改革以缓和乡村危机,解决民生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常常认为,由于地主、富农占有大量土地,因而土地越来越集中,而现在有不少学者提出,近代乡村土地不是越来越集中,而是越来越分散^[22]。不管近代乡村土地所有权是越来越集中还是越来越分散,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即近代乡村各阶层土地占有不均^{[23](P270~27)}。农民生产主要依靠土地,土地多少和质量好坏决定了农民生产的好坏。许多人认为农村问题的重心是土地问题,如果土地问题解决了,农民生产问题也自然随之解决,农民生产问题解决了,农民生活就不成问题,农村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土地问题。^{[24](P200)}土地改革成为当时解决农村问题的主要选择之一。“这年头弥漫着解决土地问题的声浪。从国联驻华专家起,至国内学术团体止,都会提出‘急需改革土地制度’或是‘以分配生产为重心来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25](P48)}“土地问题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更加生死攸关的问题。”只有通过合理有效的土地改革,才能解除农民的痛苦^{[26](P239)}。如何进行土地改革,中共提出,没收地主、祠堂庙宇和其他公共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然而随着土地革命的推进,中共进一步没收了富农出租的土地,甚至还没收了富农自耕的土地,把这些土地平均分给了贫雇农。随后,中共还没收了地主、富农的房屋、耕畜、生产工具,并分配给贫雇农。^[27]“由于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剥削制度,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关系,无地少地农民取得了一些土地。”土地革命时期,赣西南苏区多数农民分到 6—7 担田;闽西苏区的龙岩县每人分 18 担田,上杭农民分到

12担田,长汀农民分12担田,连城农民分4担田;湘鄂赣苏区的浏阳县,田多的乡农民人均分田8担,田少的乡分田5担。^{[28](P506)}抗日战争时期,地主、富农土地占有减少,而中农、贫农、雇农户均占有土地增加。^{[28](P573~603)}“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约有1亿多农民从地主和旧富农手中获得了3.7亿亩土地,并获得了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19](P618)}

当时人们认为,通过土地改革使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分配了土地,可以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共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在华东局会议上说:“土改是为了使农民生产资料得到保证,提高生产力,把旧的生产关系打破,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这样才能发展生产力。”^{[29](P157)}从理论上讲,土地改革解放了大多数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但是,实际情况却可能会出现与之相反的发展趋向。当时有人担心土地革命会破坏生产的发展,“许多博士教授以为土地革命只能解决分配问题,不能解决生产问题,甚至会使农业生产愈益衰落”^{[16](P18)}。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的土地改革不但未能发展生产,反而出现了生产破坏的现象。湘赣边苏区在革命之后,生活支出大幅度上涨,一些地方四斤肉要一元钱,一斤鸡要两百钱,一斤萝卜、冬瓜、青菜等要一百钱,米相对较便宜,也要三元大洋一石,但是,一元钱只能买二斤或四斤盐,六斤茶油。这种物价和红军到来之前一元多钱就可够一个人度过一个多月相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甚至布匹、棉花及日用必需品,因为无法正常供应,“价值的昂贵,等于上海的物价”^{[7](P19~20)}。1933年9月20日,赣西南特委在《赣西南的(综合)工作报告》中不得不承认,苏区在土地革命后已经推翻了封建剥削,在经济上应该有很好的发展,但是,由于苏区工作上的问题,苏区经济出现了停滞状态。^{[7](P410)}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开展的土地改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由于过去我们的土改中有许多偏差和坏蛋的造谣破坏,引起了群众对生产的许多顾虑,误解我们的平分土地是‘打乱平分’。农民对于他今天所种的土地明年是否仍归他种,以至今年是否归他收割没有把握,因此他不积极去耕地,不积极去上粪。农民的另外一个顾虑是怕生产发家劳动致富以后挨斗,因此便不肯省吃俭用勤耕苦作。这些顾虑对开展生产运动都是很大障碍。”^{[30](P260)}“某些地区土改左偏所造成去春农民生产情绪的动荡不安等,曾给

我们进行恢复生产以极大困难”^{[31](P321)}。土地革命虽然使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分配了土地,但是,它也使人们害怕上升为富农和小地主,不愿意投入生产或扩大生产规模,反而拼命吃穿^{[32](P517)}。“在农民中甚至部分的干部中……大家都不赞成使中农成为富农,认为成为富农就‘坏’了……”^{[33](P172)}中共进行土地改革,本来是希望它能解放潜在的生产力,通过发展生产来改善人民生活,然而土地改革的结果反而造成了生产发展的破坏,这是中共不愿看到的。饶漱石在谈到山东土改中出现的对生产力的破坏时说:“人要想生活,必须生产出东西,所谓衣食住行所需之物,人为了需要这些东西,必须要有生产之东西,如土地、原料等,把劳动与土地等结合,就产生生产力,这革命目的是提高生产力!”“根据这种认识来检查,土改中政策是有毛病的。”^{[29](P155)}农村革命对发展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使广大农村面临着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重要任务,因此,中共需要从农村革命到经济建设的伟大转变。^{[34](P33)}张闻天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指出:“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体贴农民疾苦,这是对的。但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合理分配别人的财富上,则是不对的。应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较妥当的。”^{[35](P185)}

基于土地改革中的教训,中共意识到仅仅通过土地改革和分配财富无法达到改善民生之目的,相反可能会带来生产发展的破坏。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中央苏区曾经尝试过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但是,这个指导思想的转型是非常不成功的,使原本脆弱的经济基础难以支撑持久的革命战争,恐怕也是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重要因素。^{[34](P36)}痛定思痛,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吸取教训,决定改变解决民生问题的思路,提出把发展生产作为改善民生的主要手段。“生产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而改善人民生活的前提是搞好生产,人民生活的改善,是和发展生产分不开的,生活是跟着生产走的……总之,生产决定一切,它决定中国的命运,它决定人民生活的好坏。”^{[36](P119)}193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在《新中华报》社论中提出,广泛开展生产运动,努力提高工农业的生产力,保证各个地区的物质供应。陕甘宁边区政府明确提出:“经济建设方面,坚持发展生产,以改善人民生活,支持长期抗战的方针。”^{[31](P81)}从陕甘宁边区开始,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从党政军学人员到全解放区的广大群众,逐渐地开展大生产运动。^{[37](P39~40)}“在土

地问题解决以后,开展大生产运动,人民收入的提高,是有很前途的。”^{[12](P8)}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标志着中共中央把发展生产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任务。1943年,毛泽东提出在有根据地的条件下,不提倡发展生产并在发展生产的条件下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只是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观点是错误的^{[38](P912)}。“由于解放区基本上只有农村根据地而无城市,基本上的生产者都是农民,当时军民生活所需要的大部分都是农产品,而且手工业和轻工业的原料也大部分来自农产品。因此,只有十分重视农业,才能抓住整个生产事业的重点,而取得大的成效”^{[37](P59)}。毛泽东认为,在各敌后根据地中开展大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就应该以农业为主体^{[38](P911)}。同时,中共党内还批评了不注意农业而重视副业生产的错误倾向。^{[12](P8)}

三、农业贷款:中共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手段

中共既然强调把农业生产放在第一位,那么解决农业生产中存在的困难就成了主要的任务。“中国整个的国家生命,是在农民,农民整个的生活要素,是在生产。但是农业生产的要素,大家都知道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力’,而在中国环境之下……在这三种要素当中比较,我国农民最受限制的就是‘土地’与‘资本’。”^{[39](P2)}中共通过土地改革暂时性地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尤其是大多数贫雇农土地短缺的问题,于是,资本缺乏问题成了制约农民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农民所有资本太少,以致不能获得适当的土地,去作农场的基础。农作的工具,只能因陋就简;农产的品种,也将就使用;肥料不能施用,病虫不能驱除,生产怎么能够发达?”^{[40](P67)}“农民分了田,生活本当比较好,但他们因缺乏资本,缺乏肥料,且因人力不足,生产上不免要受到影响。”^{[41](P347)}中共领导人刘少奇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中指出,在全国土地改革中综合各地农民要求,主要有土地、生产资本、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及公开负担四大要求^{[42](P135)}。“资本太少,农业生产不能发展;收入太少,农民生活不易维持。”^{[40](P68)}因此,解决农民生产资本问题就成为了中共改善民生的主要目标。

近代乡村农民家庭生产剩余是非常有限的,发展生产资本主要依靠负债,传统乡村借贷来源主要

是传统农业金融组织,其中私人借贷占有重要地位,而在私人借贷中,地主、富农占有比例较高。由于近代乡村社会不安定,地主和富农很忌讳别人知道他们有钱,所以他们极力回避财富外泄,因而往往拒绝向别人放款,即使愿意放款也不愿公开办理。^{[43](P62~63)}因而近代中国农民“不惟自己没有资本,就是向人家借用一点资本,也是不容易的”^{[40](P67)}。另一方面,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推行“废除一切债务”以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实行“减租减息”的农村经济政策,不仅导致了地主、豪绅和富农追缴旧欠,而且停止了乡村借贷。在土地革命中“豪绅地主则加紧对农民的压榨,实行对农民的经济封锁——停止借贷,力催旧欠……”^{[44](P25)}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实行的减息政策已经斩断了农民与传统借贷尤其是高利贷的联系,但不幸的是,农民对减息之后借不到债的担心变成了事实,农民借贷停滞已经成为农家经济生活继续运行的障碍。^{[45](P122)}因而“帮助刚分得土地的农民解决农具、耕牛、种子的困难,改善水利和交通条件,就是帮助农民得到土地后从各方面去解决他们的困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使得生产的大发展成为可能”^{[46](P112)}。为此,中共中央提出:“政府应举行大量的农业贷款,以解决农民借贷的困难。”^{[47](P371)}1938年到1945年,中共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陆续设立了多所银行,包括晋察冀边区银行、北海银行、冀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江淮银行、淮北银行、淮海银行、大江银行、华中银行、浙东银行等^{[48](P247)}。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善人民生活,各个根据地先后举办了农业贷款。1942—1945年陕甘宁边区经由建设所和边区银行发放的农业贷款,1942年366万元,1943年2780万元,1944年1亿元,1945年增至5.99亿元。^{[48](P246)}晋察冀边区银行的投资贷款额,1938年11.3万元,1940年270万元,1942年161万元、1944年11366万元、1946年564317万元。晋冀鲁豫边区1939年贷款额为930万元、1941年4366万元、1943年28589万元、1945年108728万元。1946年农业、工业贷款两项就发放了411000万元,1947年上半年这两项贷款又发放了460000万元。晋绥边区1940年9月至1941年8月贷款额为20.1万元、1945年1月至6月5360万元、1946年12月至1947年12月125673万元。山东北海银行在山东解放区农业贷款分别为1939年28万余元、1942年1152万元、1945年15617万元、1948年23008979万元。^{[49](P200~201)}

同时,中共还认识到“经济建设中的资本问题的解决,主要是吸收群众资本,把他们组织到再生产的消费的与信用的合作社之内,应该注意信用合作社的发展,使在打倒高利贷资本之后能够成为他的代替物。”^{[50](P63)}由于“信用合作社是组织人民游资,发展人民生产的杠杆”^{[51](P339)},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大力提倡合作运动,鼓励建立信用合作社,为农民解决生产资金问题。1944年底,陕甘宁边区已经建立了30多个信用合作社,存款总额达5亿元,白洋1万多元,元宝10多锭,手镯40付。^{[51](P337)}陕甘宁边区组织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对农村生产资金和农村副业的短期借贷的调剂具有重要作用。^{[51](P338)}华中解放区工作委员会提出:“解决耕牛、农具、种子、肥料缺乏的基本办法,是以当地群众互济互助为主,政府贷款为辅。”^{[52](P95)}在这种指导思想下,1945年盐城区建立合作社89个、1947年20个、1948年18个、1949年重新组织合作社45个。各地合作社在春耕中借贷种子、肥料给无法播种的社员;在春荒中借出粮食和豆本给困难群众做本钱,从事运输或副业生产,合作社在帮助社员进行生产救灾上获得了很大的成绩。^{[52](P440~445)}

中共明确规定,农业贷款的主要对象是那些生产资本缺乏的贫雇农和手工业者。一方面贫苦农民没有土地或者土地很少,很难得到银行的信用,获得农业贷款^{[53](P32)};另一方面贫苦农民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又是生产的主力军,而且他们还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本和生产资料。而在同等条件下,抗属、军属、烈属、干属、复员军人、精简人员、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等享有优先贷款权。因为这些人 是中共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重要的战斗力量和依靠力量,从贷款上适当照顾他们,也可以起到稳定军心、鼓励先进的作用。然而,随着土地改革的完成,地主、富农经济地位已降至中农、贫农、雇农甚至更低的水平,发展地主、富农生产也成为解放区经济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因而中共农村根据地对农业贷款对象的要求发生了明显变化,农业贷款对象不再规定以贫雇农为主,而是包括地主、富农在内的一切积极从事生产的劳动人民。^{[49](P185)}“有的贫苦的地主、富农,确实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再生产的,也

应贷给,这与各阶层团结互助也有很大好处。”^{[54](P785)}在土地改革中被削弱的地主和富农成为农业贷款的对象,反映了中共争取地主、富农的策略改变,客观上有助于生产发展和民生问题的解决。

四、结语

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着社会革命和解决民生两大主题,而且两大主题相辅相成,并行不悖。近代乡村民生问题虽然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但是,经济问题是解决乡村民生问题的重要基础。而近代乡村发展危机是导致近代农民经济困境的主要因素,如果能解决好乡村社会所存在的发展危机,可以为乡村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良好的条件和基础。因此,中共在领导农村革命中,非常重视乡村发展和民生问题的解决。孙中山在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曾经提出:“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是要解决生产的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也是要同时注重的。”^{[55](P469)}中共在解决民生问题时,开始选择了土地革命,从分配问题入手。在“革命史”研究范式下,人们在研究中共农村革命时,只注意到土地改革是中共动员农民的主要策略,而忽视了土地改革是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手段。土地革命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群众的经济生活,使群众没有饭吃的有饭吃,没有衣穿的有衣穿,没有事做的有事做”^{[56](P57)}。中共的土地改革使大多数贫雇农分到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解放了潜在的生产能力,从理论上讲可以促进生产发展。但是,实际上土地改革和土地分配只是发展生产、解决民生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土地改革并不必然导致生产力的发展和民生问题的解决。中共利用这种分配社会财富方式暂时性地解决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资料,却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反而引发了农业生产的破坏,最终很难达到民生问题的解决。因此,中共改变了思路,大力提倡发展生产,并要求把发展农业生产放在首位。而要发展农业生产,就需要解决农民生产资本缺乏的问题,于是农业贷款便成为解决生产资本的主要手段。至于中共在实施农业贷款政策过程遇到了哪些问题,如何解决,作者将会继续深入研究。

注 释:

① 参见吴苑华:《关切“民生”:一个不能忽视的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6期)、单孝虹:《中国共产党民生观演进探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8年第5期)、王海:《中国

共产党民生思想特点探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5期)、邹智贤:《毛泽东的民生思想及其启示——纪念毛泽东诞辰117周年》(《哲学研究》2010年第12期)、钟瑛:《陈云关于

民生为本的思想与实践》(《中国当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刘义程:《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生观》(《湖南科技大学

学报》2010年第6期)、田志杰等:《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民生问题的经验与启示》(《人口研究》2009年第3期)。

参考文献:

- [1] 王先明. 20世纪前期乡村社会冲突的演变及其对策[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4).
- [2] 赵仰夫, 盛梓夫译. 农村问题及其对策[M]. 上海: 上海新学会社, 1931.
- [3] 钱俊瑞. 〈中国农村〉发刊词(1934年10月)[A].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二辑)[M]. 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7.
- [4] 孔雪雄. 对于战时农贷之期望[J]. 中农月刊, 1942(2).
- [5] 朱其华. 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M]. 中国研究书店, 1936.
- [6] 润之. 江浙农民的痛苦及其反抗运动[A]. 江苏省档案馆藏. 江苏农民运动档案史料选编[M].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3.
- [7] 江西省档案馆,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编.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 [8] 卜凯. 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M]. 1929.
- [9] 王云五, 李圣五主编. 农村经济(上)[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3.
- [10] 薛雨林, 刘端生. 广西农村经济调查[A].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编. 中国农村[M]. 1934.
- [11] 陈希诚编. 福州紫阳村经济调查[M]. 福州: 私立福建协和农学院农业经济出版社, 1937.
- [12] 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编. 1947年华北农村经济调查[M]. 1949.
- [13] 曹幸穗. 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 [14] (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 程立显, 刘建等译.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 [15] 陈志让. 军绅政权: 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0.
- [16] 薛暮桥. 旧中国的农村经济[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0.
- [17] 张富记, 陆远权. 近代中国乡村危机简论[J]. 史学月刊, 1999(1).
- [18] 王先明, 吴瑕. 试析 20 世纪前期乡村危机的社会关怀——以〈东方杂志〉为中心的历史考察[J]. 历史教学, 2013(2).
- [19] 成汉昌. 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 20 世纪前期[M].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4.
- [20] 吴申淇. 中国都市金融与农村金融之病态及其救济[J]. 银行周报, 1933(16).
- [21] 唐启宇, 宋希痒. 农村经济[M]. 上海: 世界书局印行, 1932.
- [22] 章有义.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8(2); 郭德宏. 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J]. 中国社会科学, 1989(4).
- [23] 严中平等.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5.
- [24] 翟克. 中国农村问题之研究[M]. 广州: 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 1933.
- [25] 陶直夫. 中国现阶段底土地问题[A].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 中国土地问题和商业高利贷[M].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1937.
- [26] 费孝通.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27] 曾耀荣. 误读富农: 中共在近代土地革命中打击富农的主要因素[J]. 史学月刊, 2013(6).
- [28] 乌廷玉等. 现代中国农村经济的演变[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 [29] 生教工作中政策问题[A]. 临沂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3-1-77. 王友明. 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 1941—1951[D].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002.
- [30] 中共华东中央局关于春耕生产和救灾工作的指示[A]. 中共山东省党史研究室. 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的土地改革[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 [31] 边区建设的新阶段[A]. 甘肃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三辑)[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 [32] 戴向清.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 [33] 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农业合作化史编写办公室.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滨海区农村经济调查[M]. 1989.
- [34] 曾耀荣, 鲜晓博. 从革命到建设: 中央苏区指导思想转变分析[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3(1).
- [35] 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 张闻天文集(第三卷)[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
- [36] 发展生产与发扬民主(1949年9月13日)[A]. 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编. 张闻天文集(第四卷)[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4.
- [37] 黄文主等. 抗日根据地军民大生产运动[M].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1993.
- [38]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39] 乔启明. 农业贷款与农场投资[J]. 新农村, 1934(16).
- [40] 杨开道. 农村问题[M]. 上海: 世界书局印行, 1932.
- [41] 龚楚. 龚楚将军回忆录(下)[M]. 香港: 明报月刊社, 1975.
- [42] 白希. 开国大土改[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 [43] 陈翰笙等. 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三辑)[M]. 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9.
- [44] 中央档案馆, 江西省档案馆编. 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1929)[M]. 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 1988.
- [45] 李金铮. 革命策略与传统制约: 中共民间借贷政策新解[J]. 历史研究, 2006(3).
- [46] 刘瑞龙. 川陕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片段回忆[A]. 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 川陕苏维埃工农银行[M].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 [47]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A]. 甘肃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
- [48] 徐唐龄. 中国农村金融史略[M]. 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6.
- [49] 李金铮. 论 1938—1949 年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农贷[J]. 近代史研究, 2000(4).

- [50] 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A]. 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 川陕苏维埃工农银行[M].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5.
- [51] 陕甘宁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陕西省档案馆. 抗日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编)互助合作[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 [52] 华中工委关于秋冬两季农业生产的指示(1948年9月20日)[A]. 江苏省财政厅等. 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五卷)[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53] 陈翰笙. 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A].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 中国土地问题和商业高利贷[M].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1937.
- [54] 实业处. 一九四二年春耕贷款总结(1942年10月25日)[A]. 魏宏运等. 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四编)财政金融[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 [55] 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合编. 孙中山全集(第八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56] 江苏省财政厅等编. 华中解放区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一卷)[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Improvement of the rural standard of living by CPC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s

ZENG Yao-rong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Base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CPC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Cul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enter,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Jiangxi 341000, China)

Abstract: Modern Chines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give rise to the crisis of rural development. Likewise, CPC initializes the land reform which distributes land and production resources to the poor farmers, but reduces their passions for farmworks. Consequently, CPC reaffirms that increased production is the means and top priorit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tandard of living for the farmers. Moreover, CPC has enabled farmers to access to capital for their farmworks.

Key words: developmental crisis; production; agricultural loan; CPC; livelihood

[责任编辑 周祖谦]